

基于心理距离视域的 突发事件公众社会心态分类框架

熊亚超¹,祁慧²

(1.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 应急管理大学(筹)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廊坊 065201)

[摘要] 突发事件下的公众社会心态评估可以及时的甄别群体负性心态,促进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基于心理距离视域,构建了“事件—主体”双维度的公众社会心态分类框架,其中事件心理距离由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概率距离及关联距离组成,而主体心理距离包括情感距离、预期距离、信息距离及行动距离四个维度,并阐释了公众感知到的事件心理距离与主体心理距离的“远—近”耦合特征对社会心态的标度意义,为突发事件情境下公众社会心态评估标准提供了基线标度依据,并为政府在突发事件情境下对异质化群体的心态同质化干预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突发事件;心理距离;社会心态;分类

[中图分类号] D03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4-0049-09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复杂且高度不确定的风险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其引发的突发事件不仅威胁着公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还会对卷入突发事件的公众造成心理上的创伤,滋生恐慌、焦虑及盲从等负性群体社会心态,进而影响到公众风险认知、行为决策、政府信任、集群倾向等社会心理行为。因此,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不仅依赖于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还要精准的对公众社会心态予以把控,甄别群体性涌现的负性心态并及时开展心理干预。

突发事件情境下公众社会心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突发事件在社会心理空间的具体表现形式,从事件内视角对群体恐慌和逃逸行为的特征进行分析。突发事件会造成心理压力剧增和恐慌情绪弥漫^[1],个体的行为更容易出现从众现象^[2],群体性的逃逸也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3]。也有学者从事件外视角对部分公众的情感波动、信息行为进行了剖析^[4-5]。第二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建构突发事件“情景—应对”综合平台的研究,以突发事件下的心理行为演化为主题构建

[收稿日期] 2022-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智慧社会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研究”(批准号:21&ZD166)。

[作者简介] 熊亚超(1992—),男,江苏盐城人,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通讯作者] 祁慧(1983—),女,江苏盐城人,博士,应急管理大学(筹)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

了“事件链—舆情传播—心理行为”耦合反馈的情景推演，并结合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学编制了突发事件下人群心理和行为指标测量工具库^[6]，包括人际易感性、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等指标。第三是基于心理距离的公众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与接受性研究。灾害风险情景及心理距离是决定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的关键因素，心理距离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而公众感知灾害风险的心理距离与灾害可接受性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7-8]。

综上，已有研究集中在紧急状态下个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特点、事件内各类主体风险知觉与应对、个体间心理特征差异对行为影响、事件内的群体恐慌和逃逸行为特征等微观层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的社会心态演化规律的探讨。基于此，本文旨在以心理距离视域对公众社会心态的生成逻辑给出解释，试图从理论角度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社会心态演化的评估框架，并对警戒基线下的各类公众社会心态表征进行了剖析，以期为地方政府的应急绩效评估及社会心态韧性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心理距离的适用性分析

心理距离是指个体与目标事物或行为的亲疏，可以用来评估感知主体与客体间的契合度，旨在揭示个体心理感知的产生及调控过程，为跨领域、多学科的研究问题提供了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广泛应用在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环境科学及商学等领域^[9]，为解释各领域中的阻塞因素与其形成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路及视角。心理距离作为一种基于客体的主观感知，其距离的“远—近”能否衡量公众社会心态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有以下两点考量：

首先，突发事件具有明显的距离效应。突发事件通常伴随着风险的到来，而风险信息的事实性则是公众感知的前提，这些信息具体包括灾难发生的时间、空间、破坏程度及其可能性。这与心理距离维度研究的结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10]。从本质上讲心理距离是一种主观距离，若个体与事物保持着较高的契合度，即心理距离较近，则会体现出更细致化的表征形式；反之，人们则会倾向全局、抽象的思维方式。“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的距离远近决定关联强弱^[11]。但实际情况则更加复杂，部分公众因与灾害地区的联系比较紧密，具体表现在人际、情感及利益等方面，即使该部分人群远离灾区，但仍表现出与突发事件较强的联系。灾害的耦合性效应致使我们不能以纯粹的地理学距离理论去解释其对于公众心理的影响。故而，心理距离的理论引入能够更为全面的诠释灾难情境下公众的心理状态。

其次，突发事件下的心理距离可以作为社会心态的标度。“物理—社会—心理”三元空间是目前较为系统的解决突发事件的方法框架^[12]。其中灾难在物理空间的演化程度是可以量化的，如伤亡人数、经济损失及涉及区域等，量化的指标有助于人们更为直接地了解灾难的破坏性。而在社会和心理空间突发事件的演化程度则缺乏对应的衡量标准，因此突发事件通常在社会心理空间演变程度较为恶劣时才会引起管理者的重视。心理距离理论有助于探究突发事件中群体社会心态的演变路径，阐释公众感知到的“事件心理距离”与“主体心理距离”的“远—近”特征对社会心态的标度意义，确定社会心态演变趋势的边际，为异质化群体的社会心态治理提供逻辑框架。

三、基于“事件—主体”公众社会心态评估框架的构建

对突发事件下公众社会心态进行评估，其先决条件是评估对象的界定，即灾难发生后公众社会心态失衡的具体表现。灾难情境下民众的心理反应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物性应激，即事件本身给公

众带来的直接冲击,是人类在受到巨大威胁时本能表现出的身心反应,包括唤醒性的生理和情绪反应以及僵化的认知和行为反应^[13]。另一类是社会应激,是人类作为社会成员,在突发事件后表现出的社会性心理和行为反应^[14]。这些行为和反应受到后天影响,以社会文化为基础,应急处置中若忽略了相对内隐且复杂的社会应激,可能引发更多的群体性负性社会心态和行为,在事件时空、社会心理两个层面引起新的无序、混乱和恐慌,将严重威胁到国家稳定与民生问题。

公众社会心态评估也应囊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突发事件直接作用于个体所带来的生理反应是否得到缓解,即灾难下的恐慌情绪及灾后的心理创伤。这类心态的失衡是由于突发事件其不确定性及破坏性造成的,故而对此类心态干预的核心思路是引导公众认为灾难已经远离了人群,本文将公众与灾难间这种“远—近”距离感称为事件心理距离,当涉灾人群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负面情绪发酵,可能产生“价值衰弱、国家信任、官民冲突、反社会行为、集群倾向”等负面态度和行动。其二是社会群体负性心态的消弭程度,当个体在灾难中得不到及时的救援时,灾难带给其的负面情绪便会持续发酵并采取过激行为以寻求自我心理慰藉,具体表现为“价值衰落、国家信任、官民冲突、反社会行为、集群倾向”等,群体负性心态涌现与政府在应急处置行动中的缺位息息相关。反之,倘若公众得到了及时的援助,便会在心理上与政府保持较高的契合度,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甚至主动参与到救援之中,公众与政府的心理契合度是社会心态治理的“晴雨表”,这种契合度本文将之称为主体心理距离。

(一)突发事件下公众事件心理距离的构成

当下关于心理距离维度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概率距离及社会距离,并在不同领域验证了其适用性^[15—16]。公众的事件心理距离指的是个体对突发事件的直接感知,即“何时、何地、是否发生”,因此时间、空间及概率三个维度都能较好地阐释个体的事件心理距离。社会距离是个体的心态在社会空间二次发酵形成的亲疏感,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到事件心理距离的维度中。在实际突发事件中有部分人群虽未直接卷入灾难中,却因为利益、人际关系等动机对突发事件表现出较强的关注度,与突发事件保持较短的事件心理距离,本文将这类人群与突发事件的亲疏感统称为事件的关联距离,由此构成了事件心理距离的四个维度。

突发事件中个体感知到的时间距离是指灾难发生之时与此刻距离远近的知觉^[17]。时间距离会直接影响公众对突发事件的解读,较长的时间距离会使个体抽象、模糊的去评估风险,并致使其认知及行为的延滞。简而言之,人们只会聚焦于眼下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不是过去发生过或未来很久可能的突发事件。以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为例,疫情爆发后舆情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在疫情两次爆发的节点阶段性的达到了峰值^[18]。当突发事件持续酝酿并迅猛而至时,公众会表现谨慎的预防姿态,如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及物资的抢购囤积,迫近的时间距离会使得公众社会心态发生急剧的变化。

空间距离是指个体主观判断的与突发事件在地理位置上的远近^[19]。公众对离自己较远的突发事件通常会保持观望甚至无视的态度倾向,而对自身周围存在或即将发生的风险则会思考其危害。以邻避设施选址为例,即使选址周围的公众知道某工程会对当地城市发展的益处,但若该工程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便是小概率事件,也会引起当地公民强烈的抵抗情绪,空间距离会直接影响突发事件带给公众压力的大小。近空间距离群体对突发事件的恐慌与焦虑会使其采取激进或对抗性行为,容易引发群体性的社会应激,故而应当将该部分群体的社会心态干预作为先行策略。

概率距离是指个体主观感知的灾难发生的可能性^[20]。当个体觉得灾害必然发生时,那么此时个体对应的心理距离便为零。通常情况下公众对于灾难的重视程度与其感知到的概率距离成反比。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稳定的社会心态应该包含一种合理的概率距离,即不应出现极端距离。当绝大部分公众感觉灾难会必然发生时,那么整个社会的负面情绪将被扩散放大,进而产生群体性的社会负面行动。然而,部分灾难具有小概率、强破坏的特征,如百年一遇的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这类容易被忽视的小概率事件一旦爆发,其后果往往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如何通过风险沟通,拉近公众与此类事件的概率距离,同时避免“狼来了”心理效应就显得颇为重要。

关联距离是指个体与灾区的人、物及情感联系的紧密度。部分人群虽然在时空上远离了突发事件,但其亲人受灾、利益受损或者在其他动机的驱使下,则会对突发事件表现出较强的关注度,即与灾害保持较短的心理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该部分人群未直接受到突发事件的袭击,但其心态却与受灾群众基本同步,故而关联度较高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去缓解自身的负面情绪,如呼吁捐赠、制造舆论向应急管理主体施压等,其行为产生的社会效应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对事件保持较短关联距离群体的社会心态应给予积极引导,以期与应急管理主体形成良性互动。

(二)突发事件下公众主体心理距离的构成

有学者指出,公众与政府关系的本质是心理距离^[21]。灾难性事件之后,政府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利益立场、处置效率、信息回应等影响公众对政府可信任度评估,影响公众视角的政府亲疏关系的评判^[22]。有研究指出灾变情景下公众与政府的心理距离包括信息距离与情绪距离维度^[23],政府的行动与公众的预期同样也是主体距离的构成部分^[24]。本文在分析公众与应急管理主体心理联系的主要环节基础上,结合已有文献,提出了主体心理距离的四个维度:情感距离、预期距离、信息距离及行动距离。

公众与政府的感情是其关系亲疏的直观反映,有研究指出,构筑起心理上的联系可以使个体与他人的情感与生理状态同质化^[25],即个体与他人或组织在情感上的亲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体其内心的重视程度,有学者曾经使用情感距离来描述职工与组织间的情感交融^[26-27],同样的,公众与政府之间同样也存在情感上的交融,这种情感会受到政府应急处置效能的影响,具体包括对政府应对灾难的不利而感到失望、愤怒亦或对应急处置取得的成效而感到欣慰、开心等。因此,突发事件情境下的情感距离可以理解为公众与政府在理念、情感上的互动,是建立在彼此价值观认同基础上的理解及认同^[28]。公众与政府间的情感距离可以作为主体心理距离的测量维度之一,用以评价社会心态的演化态势。

灾难中不同处境群体的需求是不一致的,遭受突发事件冲击较大的人群希望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也有群体希冀在精神上得到安慰,而政府作为应急管理的提供者,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公众的需求寄托。但现实是公众复杂化、个性化的需求对应急管理主体而言显然无法面面俱到地去响应,现实与预期的偏差便形成了公众与政府间的心理疏远,本文将公众基于主体对突发事件管控现状基础上对灾难演化趋势做出的预期感知称为预期距离,这种距离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公众对应急管理主体的责任边界缺乏清晰的了解。此外,要警惕预期距离的底线效应,政府主导的应急管理应关注公众预期,引导其形成科学的期望和判断,这样,公众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与政府形成积极的响应,预期距离的长短会刺激公众社会心态的加速演化。

突发事件的难以预见性、破坏性以及演化的不确定性会激发公众强烈的信息行为动机,公众会

产生“通过信息互动体现社会参与”“获取信息增强对事件的控制感”“单纯的倾诉交流”“表明支持或反对立场”以及“对相关信息进行补充纠误”等等复杂的动机,进而实施“信息搜寻”“信息建构”或“信息传播”等信息行为。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众的信息行为又促使事件相关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源自不同群体的信息糅杂涌现,其中不乏公众的臆测及来自境外网络的小道消息,而非官方的负面消息则会对个体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29]。此外,政府对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时效、风格、真实性及发布机构的权威性都会影响公众的心理及行为^[30]。突发事件的信息沟通中存在着诸多的“噪音”,降低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效率,使得公众与应急管理主体间产生了信息隔阂,进而导致公众在心理上与应急管理主体契合度降低,本文将公众感知到的关于灾难真实信息的隔阂称为信息距离,用以衡量公众与政府间的主体心理距离。

政府是公共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应急管理是其化解公共风险的重要手段。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主体的行动响应效能对稳定社会心态起着主导作用。群体心态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灾害管理主体应急行为的成效。以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为例,各国家的响应行动出发点不尽相同,有以疏导、稳定公众社会心态为主的,也有以隐瞒、控制舆论试图稳定社会的,差异化的行动效能对社会心态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本文将这种政府灾难应对行动带给公众心理上的亲疏称为行动距离,这种亲属度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行动效能带给公众的心理慰藉,二是公众在应急处置中的参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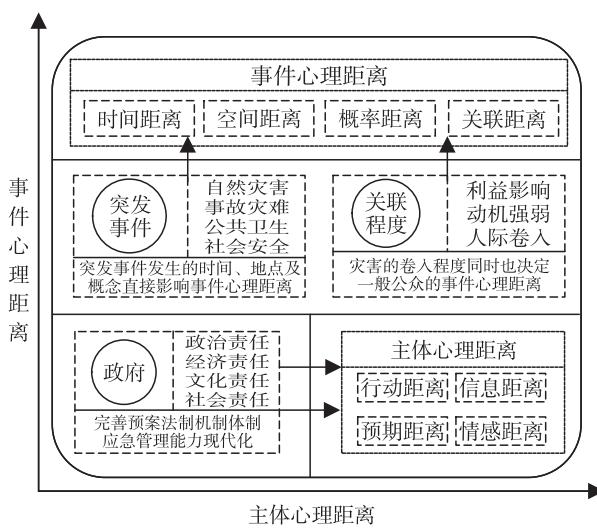


图1 突发事件下公众社会心态评估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基于“主体—事件”公众社会心态治理的绩效评估框架,旨在从公众感知到的“事件心理距离”与“主体心理距离”的“远—近”特征对公众社会心态予以评价,详见图1。

四、突发事件公众社会心态的评估标准

前文基于对突发事件下公众社会心态评估的理论框架构成及意涵的剖析,提出灾难中公众的社会心态是突发事件及应急管理主体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仅对其生成逻辑及构成的探究并不能揭示公众社会心态的演变趋势,还缺乏相对应的评价标准,因此对不同标度下的事件心理距离及主体心理距离的耦合效应展开分析就显得不可或缺,一则可以为量化政府社会心态治理绩效提供借鉴参考,二则对社会心态警戒基线的标定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管理者预防、引导及干预各类社会心态。基于此,下文对四种不同“远—近”耦合组合下的社会心态进行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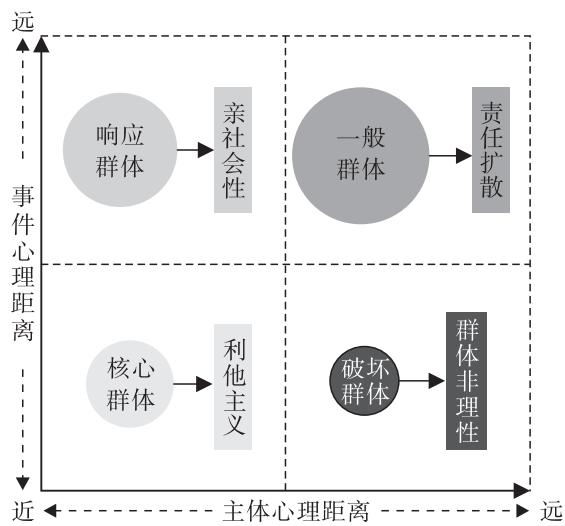


图2 突发事件下公众社会心态的评估标准

(一)“近—近”耦合型：核心群体的利他主义

核心群体指事件卷入人群及救援人群，有着较短的事件及主体心理距离。该部分群体的社会心态除了灾难带来的负面情绪外，还保留着对政府应对举措的希望和信心，甚至会自发的组织救援，形成灾难中的利他主义。社会心理学认为“利他”是以不求任何预期回报的帮助他人的行为活动，且利他主义的出现取决于个体的共情度、道德信念等因素。“近—近”耦合型群体则具备了利他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首先，该群体与灾难保持了较近的事件心理距离，对痛苦情绪的感知更为敏感，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共情。其次，他们与应急管理主体在心理上契合度较高，且多是从事教师、警察、医生及乡镇干部等职业，有着相对较强的责任、正义等道德信念，面对灾难时更能坚守住岗位，协助应急主体履行部分职能。绝大多数突发情况下，第一目击者和社区工作人员比专业应急小组更早到达现场，若此时能组织起有效的应对措施，便会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因此，能否催生“近”事件心理距离群体内心的利他主义，是公众互救能力的肘掣。此外，我国复杂的地质与人文环境加大了突发事件中的救援难度，仅凭应急主体很难将盲点扫清，但若在救援过程中得到事发地群体的积极配合，便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灾难带来的损失。

(二)“近—远”耦合型：破坏群体的群体非理性

该部分群体处在灾难事件的爆发点，且与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管理主体保持着较远的心理距离。在面对灾难带来的破坏及威胁时，其内心的恐惧、悲伤等负面情绪会导致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低下，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否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主观判断。而“近—远”耦合型群体往往会体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在灾害发生后容易自暴自弃，并对应急管理主体产生依赖性，即躺在受灾的温床上，具体表现为抢夺救灾资源、夸大事实制造舆论、与医护人员及志愿者发生冲突等行为。心理学认为人会通过本能的模仿他人的表情、语言及行为，进而产生相同的情绪^[31]。该类人群暴露在突发事件情境中时，若没有得到应急管理主体及时的援救，其局限于灾难本身的负面情绪便会在社会环境中二次发酵，轻则加剧其内心对于政府的不满，重则催生出群体的反社会心态，进而产生群体骚乱事件。

(三)“远—远”耦合型：一般群体的责任扩散

主体、事件都保持较远心理距离的群体统可称为一般群体，对突发事件保持较低的关注度。这

一群体具有大规模、分散、人口特征构成复杂等特点。责任扩散是指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多名旁观者下意识分担救助责任的现象^[32]。灾难中责任扩散的心理现象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具备较多的旁观者,二是旁观者多是报以观望、逃避责任的心态。一般群体远离灾难爆发中心且自身利益、人际关系等卷入度较低,因此从灾难的波及程度来看该类人群可以看作是突发事件中的旁观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旁观者在目睹灾难时都会选择无动于衷,但一般群体与应急管理主体保持着较远的心理距离,他们认为突发事件的应对是政府的责任,慈善募捐及志愿服务也与自身无关,甚至会大肆宣扬个体的“无责论”,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即使部分个体有承担责任的意识,也会碍于他人的不作为,与一般群众保持一致的心理表现。责任扩散心态会降低公众与灾区的情感共鸣,抑制灾难中利他主义的群体涌现,进而降低公众参与救灾的积极性。

(四)“远—近”耦合型:响应群体的亲社会性

事件距离远,而主体距离近的一类群体是响应人群。首先该群体遭遇灾难的冲击比较微弱,情绪稳定且认知理性,而与主体较近的心理距离会激发该人群的信息行为,更为全面的了解突发事件破坏程度及政府的应对行为。因此,“远—近”耦合型人群会对受灾群众遭遇的痛苦有更为直接的体验,更容易产生共情效应,而这种情感共鸣能够唤起个体内心的责任感与助人行为,迅速地响应政府参与抗灾的号召,催生一系列的助人行为,例如捐款、献血、志愿服务及提供技术支持等。不同于利他主义行为,响应群体的助人行为会夹杂着一些利益动机,如塑造形象、提升地位及提高自身情绪的满足感等,这种为了他人利益而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的行为就是亲社会性的表现^[33]。从宏观上看,响应人群亲社会性心态的群体涌现是有利于抗击灾情的,即便这种心态可能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此外,要警惕响应群体中出现过度追求自身利益的亲社会行为,如借募集之名倒卖应急物资、“做秀式”救援等。

五、结论与讨论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事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是政府必须予以重视的议题,公众是突发事件的最先感知者,对公众社会心态予以评估有利于甄别群体负性心态,预防甚至规避突发事件带来的衍生破坏。学界围绕政府在物理及社会层面的应急处置成效进行了重点探讨,而突发事件下社会心态的治理则缺乏对应的评估工具与标准。本文基于心理距离理论,构建了突发事件下社会心态治理的绩效评估理论框架,该评估框架通过衡量公众感知到事件心理距离及主体心理距离的“远—近”来反映公众社会心态的演化趋势。此外,本文对不同“远—近”下事件心理距离与主体心理距离的耦合效应进行分析,提出了核心群体的利他主义、破坏群体的群体非理性、一般群体的责任扩散及响应群体的亲社会性四种社会心态,为公众社会心态治理成效的评估提供了基线标度,也为政府在异质化群体中的心态同质化干预提供了理论借鉴。

本文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也是笔者后续的研究方向。第一,缺乏量化的评价工具开发。基于“事件—主体”的公众社会心态分类框架未直接对公众心理状态予以描述,还需在该理论基础上加以测量工具的开发,将公众感知到的心理距离加以量化,并与本文提出的分类标准予以对标。第二,该理论框架还需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等,加之心理测量无法确立起类似于物理测量的绝对尺度,故而该分类框架在不同类型突发事件中的适用性需要继续检验。

[参 考 文 献]

- [1] 时勘,覃馨慧,宋旭东,焦松明,周海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01):46—56.
- [2] 马庆国,王小毅.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影响当事人状态的要素分析与数理描述[J].管理工程学报,2009,23(03):126—130.
- [3] David, J. L. Following the crowd[J]. Nature, 2000,407:465—466.
- [4] 宋辰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情感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3):45—53.
- [5] 熊励,郭慧梅.基于动机认知理论的突发事件网络信息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杂志,2021,40(05):125—131.
- [6] 张辉,刘奕.基于“情景—应对”的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基础科学问题与集成平台[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32(05):947—953.
- [7] 尚志海,梁晓慧,李春红,郭照华,古凯业,莫骞.基于心理距离的公众台风灾害风险感知比较分析——以湛江市和珠海市为例[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9,21(04):66—74.
- [8] 刘羿澐,刘旭锋,肖璐,钟鸣.基于心理距离的社区内涝风险感知差异性分析[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21,23(02):70—78.
- [9] Li S, Chen H, Feng Y,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matic evolution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A co-word anal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 research[J]. Current Psychology, 2020;1—15.
- [10] Johnson B B.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Americans' Risk View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Regarding Zika Virus[J]. Risk Analysis, 2018,38(12):2561—2579.
- [11] Tobler W 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1970,46(2):234—240.
- [12] 范维澄,霍红,杨列勋,翁文国,刘铁民,孟小峰.“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结题综述[J].中国科学基金,2018,32(03):297—305.
- [13] 董惠娟,顾建华,邹其嘉,杨彦波.论重大突发事件的心理影响及本体应付——以印度洋地震海啸为例[J].自然灾害学报,2006(04):88—91.
- [14] 许燕,伍麟,孙时进,吕小康,辛自强,钟年,彭凯平,周明洁,栾胜华,郭永玉,王俊秀.公共突发事件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笔会)[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8(02):1—31.
- [15] Bar-Anan Y, Liberman N, Trope 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onstrual level: evidence from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06, 135(4): 609—622.
- [16] Steidle A, Werth L, Hanke E V. You Can't See Much in the Dark: Darkness Affects Construal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J]. Social Psychology, 2011,42(3):174—184.
- [17] 郑君君,蔡明,李诚志,邵聰.决策框架、心理距离对个体间合作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J].管理评论,2017,29(05):102—109.
- [18] 彭宗超,黄昊,吴洪涛,谢起慧.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应急防控的“五情”大数据分析[J].治理研究,2020,36(02):6—20.
- [19] Tan H, Wong-Parodi G, Xu J. Not under my backyar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local acceptance, and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China[J].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20,61:101336.
- [20] Johnson B B.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Americans' Risk View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Regarding Zika Virus[J]. Risk Analysis, 2018,38(12):2561—2579.
- [21] 刘小燕.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内涵与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06):148—155.
- [22] 顾爱华,冯汝莹,崔晓芳.中国应急管理研究的可视化与热点趋势分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1):1—14.

- [23] 尚志海. 基于心理距离的灾害可接受风险研究[J]. 灾害学, 2018, 33(3): 12—16, 18.
- [24] Li S, Chen H, Huang X, et al. Chinese public response t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roblems—A study based o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1): 1944.
- [25] D Cwir, Carr P B, Walton G M, et al. Your heart makes my heart move: Cues of social connectedness cause shared emotions and physiological states among stranger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7(3): 661—664.
- [26] Chen H, Li S. Measuring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an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scal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8: 2296.
- [27] Li S, Chen H. Closeness or distance? An investigation of 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 From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erspectiv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2765.
- [28] 黄文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舆情引导与社会信任建设研究[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9(02): 14—19..
- [29] Covello V T, Peters R G, Wojtecki J G, et al. Risk communication, the West Nile virus epidemic, and bioterrorism: respond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release of a pathogen in an urban setting[J].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2001, 78(2): 382—391.
- [30] 惠志斌.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与管理初探[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55(03): 18—22+26.
- [31] 张奇勇, 卢家楣, 闫志英, 陈成辉. 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J]. 心理学报, 2016, 48(11): 1423—1433.
- [32] 叶青青. 看客式冷漠:心理机制、产生原因及求解之匙[J]. 理论与改革, 2016(04): 128—131.
- [33] 肖凤秋, 郑志伟, 陈英和. 亲社会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演进[J]. 心理科学, 2014, 37(05): 1263—1270.

(责任编辑:闫卫平)

A Framework for Classifying Public Social Mindset in Emergencies from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erspective

XIONG Ya-chao¹, QI Hui²

1.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Xuzhou, Jiangsu, 221116;

2. Universit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reparatory),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Langfang, Hebei, 065201)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public mindset under emergencies can promptly screen negative group mindset, promote the “gateway” to risk management and enhance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vent-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which of the events consists of temporal distance, spatial distance, probability distance and association distance, while that of subject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distance, action distance, information distance and expectation distance, and explains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event. It also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r-near”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the subject’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n the social state of mind, and provides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public state of mind in the context of emergencies.

Key word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ublic mindset; classifying